

# 从空间再生产到地方营造:中国城市更新的新趋势

谢涤湘<sup>1 2 3</sup> 范建红<sup>1 2 3 \*</sup> 常江<sup>4</sup> (1.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90; 2. 中国城市科学学会 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 广东 广州, 510090; 3. 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 广东 广州, 510090; 4.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地理、环境与空间科学系, 密歇根州 东兰辛 48824)

**【摘要】**城市更新是 21 世纪最受关注的城市发展与规划议题。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延续城市特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城市的生机活力,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难解的话题。人文地理学学科的“地方理论”为分析和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在辨析“空间”与“地方”的概念的基础上,对“地方理论”进行了引介,并介绍了其描述取向、社会建构取向和现象学取向等三大分支。从“地方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更新存在的问题,指出城市更新的对象应该是“地方”——其不仅是物理空间和经济空间,还是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城市更新应该关注“地方”形成演变的社会经济政治机制,推进“地方营造”而不是“空间再生产”;我国的城市更新不应该盲目地追求所谓的科学理性、经济理性和“宏大叙事”,要真正展现出人文关怀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市民的力量,营造出有内涵、意义、特色的“地方”,而非标准化、同质化的“空间”。

**【关键词】**空间再生产;地方营造;城市更新;中国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 0 引言

城市是人口、经济和文化高度集聚之地。城市的发展引领着人类的文明。工业革命以降,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多,城市化水平日趋提高,人类已经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从城市诞生之日起,城市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便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时代,城市内的街道和建筑也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而是或多或少经历着更新改造。在学术界与实践中,与城市更新改造相关的概念名词包括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旧城改造(urban renewal)、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和城市重建(urban rebuilt)等。这些概念反映了城市更新改造的不同价值观、理念与模式。当前,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的概念较为被认可,其强调的是对城市社会经济物质文化进行综合性地调整完善,以延续

历史文化,改善市民生活品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sup>[1]</sup>。城市更新改造作为一种空间行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策略,是推动近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兴起的社会背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基于城市公共卫生运动、城市美化运动的欧美国家的城市更新运动导致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从工业化时代逐步转向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大幅度转型,城市更新更明显加快,并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轴。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最初焦点是关注物质环境的更新和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许多城市对城市中心区贫民窟“手术刀式”的大规模改造以及“绅士化”(gentrification)<sup>[2]</sup>的街区再造。但这种做法所导致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并因此引发了激烈的社会抗争运动,遭到了许多学者非常严厉的批评。例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新闻记者雅各布斯,就强烈批评美国内城广泛的大规模推倒重建的城市更新改造做法<sup>[3]</sup>。1970 年代末以来,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在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271162);广东省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项目(编号:2015A020219006)

\* 通讯作者:范建红(1976-),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Email:43223201@qq.com

西方城市中已经很少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的、渐进式的更新改造。城市更新改造的模式从房地产主导向公私合营、公众参与(PPP模式)、邻里(社区)参与转变,注重对历史文化遗产、社区网络和地方特色的保护,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注重社会融合<sup>[4-7]</sup>。但当前我国的城市更新,尚在重复西方城市曾经走过的弯路,简单纯粹追求物质环境的改善、经济的发展和形象的营造,城市空间沦为了“居住的机器”、“经济的机器”,文化遗产被当作商品贩卖,而忽视了人的情感、历史脉络,使得市民的集体记忆、地方认同逐步丧失。为此,本文主要从“地方”理论的视角,研究我国城市更新的思路 and 策略。

## 1 人文地理学的地方理论

### 1.1 从“空间研究”走向“地方研究”

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的研究对象均为空间,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研究空间形成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门强调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学科;而后者则研究空间应怎样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是一门强调技术实践的应用性学科。因此,人文地理学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理论基础。早期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关注的是特定空间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多采用描述性的方法,主要分支为区域地理学、工业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二战”后,随着计量科学、系统科学的发展,人文地理学走向“科学化”,强调运用数理模型、统计分析等量化分析方法对空间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城市地理学、商业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分支发展迅速。1970年代后,随着欧美国家城市社会问题的爆发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文化转向,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快速兴起,遂推动了社会地理学、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等新人文地理学学科快速发展。

在当代人文地理学领域,“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是两个非常相关但却有着本质差异的概念。“空间”是抽象的、客观的和物质的,而“地方”则是具体的、主观的和经验情感的。早期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都可谓是关于“空间”的研究,核心是经济事物的区位及空间分布规律、地域空间结构等议题,强调对空间进行科学、量化和系统的分析。近二三十年来,“空间”的研究仍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识到,“空间”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几何实体,其与社会密切相关,与

人的认同、记忆、想象和依恋等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无论是空间的生产还是空间的再生产,都需要考虑其与社会的关系、与人的精神情感的关系,考虑空间的符号意义功能和精神情感价值。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地方”的研究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

### 1.2 地方理论的形成演变

地方理论是近三四十年来全球人文地理学界高度关注的领域。地方理论的兴起是人文地理学受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文化转向”思潮等发展影响的结果,地方理论与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环境心理学和城市研究等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地方的概念最早由Wright提出,他认为“地方是承载主观性的区域”<sup>[8]</sup>。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地方被视作某种空间的表现形式,是规律性和均质性的表现<sup>[9]</sup>,70年代之后,许多人文地理学家反对科学理性逻辑实证的传统人文地理学思维和研究取向,强调从人的经验、记忆、情感和意义等角度出发,展开对地域空间的研究。著名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文孚(Yifu Tuan)认为,“空间”和“地方”共同决定了地理学的本质<sup>[10]</sup>。“地方”强调人类的情感经验意义,是有生命的,而“空间”则是指纯粹的、物理的、自然的、抽象的和几何的空间,是没有生命的<sup>[11]</sup>。当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时才能称之为地方<sup>[12]</sup>。地方是意义的中心和社会的建构,是一个关爱的场域(field of care),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类普遍都有“恋地情结”(topophilia),即对某一特定区域有深刻的情感联系,而个人的经验是地方创造的核心<sup>[13]</sup>。Wright将之总结为敬地情结(geopieté),既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信仰与崇拜<sup>[14-15]</sup>。Relph认为人对于地方的依附是很重要的人类需求,除了满足互相关照的感受之外,更根本的是“在某个地方有根,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安全的立足点,可以从那里观望世界、牢牢掌握自己在万物秩序中的位置”<sup>[16]</sup>。Seamon将人们日常生活行为比作芭蕾表演,其“时空惯性”(time-space routines)便形成了不同地方的不同文化,既“地方芭蕾”(place ballet)<sup>[17]</sup>。

1970年代,Tuan、Relph等学者的“地方”概念的提出,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自此之后,大量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和城市研究学者对“地方”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英国地理学家Cresswell甚至认为,人文地理学的研

究,实质上就是地方的研究<sup>[18]</sup>。

### 1.3 地方理论的三大分支

当前,人文地理学是有关“地方”研究的前沿阵地。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而言,地方理论包括三个取向:

一是描述取向。这种取向认为世界乃是由一个个地方构成,每个地方都可以作为独特的实体来研究<sup>[18]</sup>。这种研究取向,关切的是某一地方(地域)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继承的是美国地理学家 Sauer 开创的“文化景观学派”<sup>[19]</sup>,也是迄今区域地理学家、文化地理学家最常采用的研究方法。

二是社会建构取向。主要探讨地方如何经由社会政治经济、性别和种族而建构。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采取这种研究取向,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 Allen Pred、Henri Lefebvre、David Harvey、Doreen Massy 等人<sup>[18]</sup>。Pred 认为地方是社会和文化形态再生产的过程<sup>[20]</sup>。Lefebvre 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或资本投资是按照土地的大小、宽度和位置等抽象维度特征——“抽象空间”来考虑空间的开发利用,与此相对的则是作为日常生活中承载相互作用的“社会空间”<sup>[21]</sup>。Harvey 则认为地方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地方并非自然天成,人类的力量可以塑造地方,也可以毁灭地方<sup>[22]</sup>。Massey 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是开放的,与外界有着密切的社会联系,并处于不断再建构过程中。地方的独特性是因为地方是全球与地方的社会关系混合的结果<sup>[23]</sup>。城市增长机器理论(urban growth machine)也揭示了地方的社会建构过程,认为城市中的各个利益集团形成联盟,透过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谋取最大经济利益<sup>[24-25]</sup>。

三是现象学取向。这个取向并不特别关心特定地方的独特属性,也不太关切涉及特殊地方建构的社会力量。反之,这种取向尝试将人类存在的本质界定为必然且很重要的“存在地方”<sup>[18]</sup>。这一理论分支的代表人物包括 Tuan、Relph、Buttimer、Seamon 等人,地方表达人们对世界态度的概念,强调主体性和经验的面向。换言之,地方被视为一种观念、概念以及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的方式<sup>[26-27]</sup>。这一理论分支衍生出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sup>[12,28]</sup>、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sup>[29-30]</sup>、地方认同(place identify)<sup>[31]</sup>、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sup>[32]</sup>和社区依恋(community attachment)<sup>[33]</sup>等相关理论。朱竑等对以上衍生理论进行了引介与辨析<sup>[34]</sup>。

现象学取向的地方研究使人们意识到“抽象空间”和“意义空间”的重要区别,其特别强调人与空间的情感联系。其中地方依恋的研究即是一个典型。地方依恋关注的是人们对各种类型地方的情感依恋状况,研究对象包含了洲、国家、城市、社区、家甚至是卧室在内的从大尺度到小尺度的地方,也包括第二居所、度假屋、宗教场所、工作地、足球场、虚拟或想象地方等一切有意义的地方<sup>[35]</sup>。学者们研究人们对于不同类型的地方有着怎样的情感依恋以及影响地方依恋的因素。

## 2 从空间再生产到地方营造

始于 19 世纪末期的现代城市更新运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其总体规模相对较小,受“城市美化运动”的影响,强调对城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如 19 世纪末巴黎总督豪斯曼对巴黎的改造;第二阶段是“二战”之后至 1970 年代,城市更新运动发展迅速。盛行于这一时期的“现代城市”理论、“理性城市理论”、“系统城市理论”都将城市当作“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城市也被视为经济社会的“容器”,因而可以根据所谓的“理性原则”肆意地对城市空间进行利用,而无须考虑城市空间的历史脉络与市民情感。1980 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价值观和目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关注到微观主体人的需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需要、社会融合的需要、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认同与归属的需要,因而也导致了城市更新的规模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营造(place-making)<sup>[36]</sup>成为普遍认同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和城市迅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城市透过“郊区化”、“新城建设”和“开发区建设”向外扩张,城市发展的重点是外围地区,老城区的改造规模相对较小,仅对危旧房进行改造。2000 年后,随着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耕地的严格保护以及土地出让的严格控制,城市更新开始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城市发展开始从土地的增量开发转向土地的存量开发。我国的城市更新自此开始迅速发展,其中的重点工作是“三旧改造”,即旧

城、旧村和旧厂的改造。城市更新不但推动了城市物质环境的改善,也进一步带动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2015年末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不但要重视推进城市更新,还要积极推进小规模、渐进式的城市修补。城市更新和城市修补都要注重“以人为本”。但总体来看,我国的城市更新还存在严重的问题——城市更新只重视“空间”的再生产,而不重视“地方”的营造。城市政府最为关注的是空间环境的形象提升问题和空间利用的经济效益问题。以广州为例,在该市制定的《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中指出“城市更新”是指由政府部门、土地权属人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主体,按照“三旧”改造政策、棚户区改造政策和危破旧房改造政策等,在城市更新规划范围内,对低效存量建设用地进行盘活利用以及对破旧房进行整治、改善、重建、活化和提升的活动。定义明显指向为提高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和空间环境改善。在这种背景下,城市政府制定了宏大计划推动老化衰败街区的改善,并推动城市土地利用的“功能置换”,许多老住区、城中村遂纷纷被中高档住区、购物中心、酒店和写字楼所取代。而城市更新在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低收入群体被中高收入阶层所替代的“绅士化”现象,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sup>[37-38]</sup>。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和规划人员往往将城市更新地区视为“空间”而非“地方”,忽视了微观市民的社会经济利益和情感精神需要。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发展的同质化、标准化现象正越来越突出,城市正越来越失去其特色,人们被迫生活在无地方性、无意义的空间。尤其是城市更新完全被资本所主宰,空间的意义价值、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或被视而不见或仅成为一种装饰点缀<sup>[39]</sup>。快速的城市更新导致了“地方”正加速消亡。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促进地方营造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地方特色的保护、物质环境的改善、市民权利的保障和坚持民众的主体性是城市更新中最为关键的方面,它们对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城市更新要高度关注文化、记忆、认同和情感等无形的资产,也要高度认识到资本和权力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我国的城市更新不应该盲目地追求科学理性、经济理性和“宏大叙事”,而应该关注地方化的、真实的

日常生活图景<sup>[40]</sup>,要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进行“地方营造”,而不是“空间的再生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城市空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经济资源。Harvey认为资本透过对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实现资本的循环与增殖<sup>[41]</sup>。因此,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并不是简单的物质环境的修补、重建,也包括了经济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和政治在地方构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资本和政治往往也会在城市更新中带来“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如文化遗产被破坏、传统社区解体、低收入阶层被迫迁离、大量无地方性的标准化和商业化空间涌现,等等。

### 3 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因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逐步从粗放型转向精致型,更加注重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也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在城市更新中促进“地方”的营造就非常有意义。从“地方”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城市更新应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城市规划与设计时一定要将规划对象作为一个蕴含着丰富内容与意义的“地方”来看待,任何将规划对象视为“抽象的几何空间”都是错误的。城市更新应着眼于市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一味追求“宏大叙事”。这是Lefebvre、Jacobs等学者学术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央提出的“城市修补”战略的体现。为此,城市更新不能“运动式”推进,不能一味追求大项目,更不能大拆大建,而是要透过事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修修补补”的点点滴滴行动,切实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城市规划与设计应该认识到社区的重要性,将社区发展与社区规划列入重点,重新营造居民的社区感<sup>[40,42]</sup>。

二是城市更新应注重营造出具有历史脉络、体现传统特质的“地方”而不是生产出标准化、同质化的“空间”。城市更新应尽可能保护传统的地方特色(自然特色、社会特色和文化特色等)、保持传统的社区网络、维护原居民生活栖息在本地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sup>[43]</sup>,避免被驱离(displacement)<sup>[44]</sup>,避免过度的“绅士化”。

三是城市更新应该体现“进步”的更新改造观。即城市更新不能完全强调保护而无所作为,这对于那些生活在破败街区、危楼旧屋的市民来说是非常

不公平的。在人们的生活中,“面包”和“文化”都不可或缺,但“面包”相对来说是第一位的。因此,应探讨如何在保护地方特色、延续地方传统的前提下,满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城市更新既要强调历史文化的保育,也要促进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变静态僵化的保护为动态灵活的保护。

四是城市更新应注重多方的参与、权力与利益的平衡。城市更新中的地方营造不能完全依赖地方政府,更不能完全依赖商业资本,而是应该注重公众的参与、邻里的互动,凝聚居民的智慧与力量。这不但有利于彰显居民在城市更新中的主体性,也有利于营造出真正满足市民认同和情感依恋需要的地方。

五是城市更新不仅应着眼于物质环境的建设改造,还应重视非物质性的策略行动。如保护传统地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市民共同参与与邻里的更新改造、促进邻里的社会交往与团结和改善社区的治安等等。这些行动对于促进地方的营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市的空间归根到底是人的空间、是社会的空间。正如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是社会的,社会也是空间的”<sup>[21]</sup>,也正如当代人文地理学家们所普遍认同的:地景都是人文地景,更遑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的利用实质上是地方权利格局的反映,也是地方社会文化的反映。城市空间也是意义空间和情感空间,人们透过日复一日的地方生活,对地方产生情感与依恋,产生认同与归属。因此,城市更新不能生产出没有情感、没有“地方性”、完全被资本所把控的“空间”,而是要营造出蕴含着具有丰富情感、“地方性”、被居民所把控的“地方”。△

#### 【参考文献】

- [1] Jones, P.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UK [M]. London: Sage, 2008.
- [2] Glass R.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M].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64.
- [3] Jacob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 [4] Henneberry, J and Rowley, S. Development cultures and urban regeneration [J]. *Urban Studies*, 2002, 39(7): 1181-1196.
- [5] Smith, M. Tourism, culture and regeneration [M]. Trowbridge: Cromwell Press, 2006.
- [6] Smith, A. Events and urban regeneration: The strategic use of events to revitalise cities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 [7] Cameron, S. Gentrification, housing redifferentiation and urban regeneration [J]. *Urban Studies*, 2003, 40(12): 2367-2382.
- [8] Wright J K. 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47, 37(1): 1-15.
- [9] 周尚意,戴俊骋. 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 [J].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21-1532.
- [10] Tuan Y-F.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M] // Board C, Chorley R J, Haggett P, et al (eds.). *Progress in Geography: International Reviews of Current Research*, Vol. 6.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4: 211-252.
- [11] Tuan Y F.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J]. *Geographical Review*, 1975: 151-165.
- [12]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13] Tuan, Y 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M]. Englewood Cliffs, N J: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14] Wright J K. Notes on early American geopiety [J]. *Human Nature in Geography*, 1966, 45: 250-285.
- [15] Wright J. Geopiety: A theme in man's attachment to nature and to place [M] // Tuan Y F (eds.). *Geographies of the Mind: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76.
- [16]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Pion, 1976.
- [17] Seamon D.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Movement, rest and encounter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 [18] C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 [19] Sauer, C.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 in Geography*, 1925, 2: 19-54.
- [20] Pred A.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 74(2): 279-297.
- [2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Blackwell: Oxford, 1991.
- [22] Harvey D. and Braun B.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 Oxford: Blackwell, 1996. [12] Massey D. For space [M]. London: Sage, 2005.
- [23] Massey 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J]. *Marxism Today*, 1991, 35(6): 24-29.
- [24] Molotch H.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82(2): 309-332.
- [25]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 城市文化读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6] 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 [M]. Translated by MacQuarrie and Robinson E.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1962.
- [27] Relph E. Geographical experiences and being-in-the-world: The phenomenological origins of geography [M] // Seamon, D. and Mugerauer, R. (eds.).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person and world*. Albany, New York: SUNY Press, 1985.
- [28] Relph, E. Sense of place [M] // Susan H. (eds.). Ten

- geographic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9] Gerson, K., Stueve, C. A. and Fischer, C. S. Attachment to place[M]// C. S. Fischer, R. M. Jackson, C. A. Stueve, K. Gerson, L. Jones, M. Baldassare (Eds), *Networks and Places*, (p. 139 - 161).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 [30] Hidalgo, M. C., and Hernandez, B.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3), 273 - 281.
- [31]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and Kaminoff, R.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83, 3(1), 57 - 83.
- [32] Stokols, D., & Shumaker, S. A. People in places: A transactional view of settings [M]// In J. Harvey (Ed.), *Cognitio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 (p. 441 - 488).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1.
- [33] Kasarda, J. D., and Janowitz, M.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4, 39(3), 328 - 339.
- [34] 朱竑, 刘博. 地方感, 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1): 1 - 8.
- [35] Lewicka M.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 31(3): 207 - 230.
- [36] Friedmann J. Place and place-making in cities: A global perspective[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0, 11(2): 149 - 165.
- [37] He S.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n Central Shanghai: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0, 16(5): 345 - 361.
- [38] He S, Wu F. Socio-spatial impacts of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on China's urban neighbourhoods [J]. *Cities*, 2007, 24(3): 194 - 208.
- [39] 约翰·弗里德曼. 生活空间与经济空间: 区域发展的矛盾[J]. 戈岳, 译. *国际城市规划*, 2005, 20(5): 5 - 10.
- [40] 黄瓴, 许剑峰. 城市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价值基础和角色建构研究[J]. *规划师*, 2013(9): 11 - 16.
- [41] Harvey D.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M].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0.
- [42] 赵民, 赵蔚. 关注城市规划的社会性——兼论城市社区发展规划[J]. *上海城市规划*, 2006(6): 8 - 11.
- [43] Harvey D. The right to the city [J]. *New Left Review*, 2008(9): 23 - 40.
- [44] Wu F. Residential relocation under market-oriented redevelopment: The process and outcomes in urban China [J]. *Geoforum*, 2004, 35(4): 453 - 470.

作者简介: 谢涤湘(1974 -), 男, 湖南攸县人, 博士, 教授, 注册城市规划师。研究方向: 城市与区域发展及规划, 城市社会文化地理学。

收稿日期: 2017 - 07 - 27

## From Space Reproduction to Place-making: The New Trend of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

XIE Dixiang, FAN Jianhong, CHANG Jiang

**【Abstract】**Urban regene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discussed topics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urban plan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Going through an urban regeneration process, it is important yet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local features and facilitate social justice, while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of residents. The place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could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to solve aspects of this complex phenomena.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concepts of "space" and "place", introduced the "place theory" and its three branches. We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theory", pointing out the object of urban renewal should be "place"—not only physical space and economic space, but it should include social space and spiritual space. Urban regener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mechanisms of place, and facilitate "place-making" rather than "space reproduction";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 should not aimlessly pursue the so-called scientific rationality,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grand narrative". Chinese urban regeneration should pursue the value of humanistic concern and the social justice giving power to the public to create a connotative, meaningful, and distinctive "place", rather than a standardized and homogeneous "space".

**【Keywords】**Space Reproduction; Place-Making; Urban Regeneration; China